

毛泽东的 探索

——中国的1956—1976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建造了辉煌的业绩，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份宝贵“财富”，是我党正确总结自身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 著

版社

毛泽东的

探索



中国的 1956—1976

雍涛●著

(豫)新登字01号

毛泽东的探索

——中国的1956—1976

雍涛 著 责任编辑 李自强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郑州中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63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5-03116-0/A·29 定价6.80元

前 言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事业和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仍然发生着直接的巨大影响。因此，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富有魅力的时代课题。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的一生有成功，有失败，有高峰，有低谷，他的思想也经历了早期、中期、晚期的发展演化过程。然而，过去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他的理论和实践，中期（即成熟时期）研究较多，早期也曾成为热点，而晚期则研究不够。这无论是同国外学者的研究比较起来，还是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比较起来，都显得落后了。

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许多刊物发表了不少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有关的专著、教材也相继问世，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演化、特别是晚期的理论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失误，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深入分析。目前出版的一些论著，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一面；很少讲他失误的一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此相反的另一倾向

向是，有极少数人借口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态度当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如实地展现毛泽东晚期思想和实践活动，客观地探讨他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本书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试图在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方面作一点努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讲的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是指1956年以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心内容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种种设想与试验。这种探索和试验是从1956年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的，同时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他决心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于是就有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索，以及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等等。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断了这种探索。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种试验，当然这种试验是失败的。但毛泽东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反而认为当时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具体工作中的一些“左”的错误，而且他的确为此花了很大的气力，在纠“左”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等要求从指导思想纠正“左”的错误时却遭到他的严厉批判，纠“左”因此被打断。接着是高指标、“共产风”再起，“大跃进”的试验不得不中止。从1961年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过程，毛泽东提倡调查研

究,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同样是在坚持“左”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许越雷池一步。一旦超出他规定的界限,他就很快地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警告说中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他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要“反修防修”,搞四清和五反,“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而导致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当然从历史的长河和历史的目光看,“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试验”。以上这一切都应该看作毛泽东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好好地总结和利用。正是根据这个思路,本书采取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论析为主调,分六章探讨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前五章分阶段论述,最后一章从哲学上分析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研究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同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对我们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1956年前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年底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在初步纠“左”过程中的探索、1961年开始的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的探索,都为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1956年前后的探索,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至于反

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则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和危害，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反面的经验对于我们同样是富有教益的，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还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历史任务等密切相关。我们说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开放什么？说到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革在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所定型的我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就是要走出在毛泽东晚期“左”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某种封闭状态（当然其中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中苏关系恶化等客观原因）大胆地对外开放，使我国成为生机勃勃、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强国。

其次是研究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分析长达 20 年的“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贯彻中央提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指导思想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中间虽有所觉察和纠正，但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所以邓小平后来指出：“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5 月版，第 325 页。

化大革命’是极左。”^①又说，“‘左’的错误持续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力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②“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迷误；有对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有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映等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我们党内和社会上“左”的思想又有所露头，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则更为明显。有的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有的人主张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来抓；有的人提出要重新开展“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大概也是对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了“过火反映”的缘故吧。这一切说明，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一有适当气候就会冒出来，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认真总结毛泽东1956年后未能正确指导反倾向斗争和他犯“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会有助于增强我们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最后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应该说是可以的，不违常规的。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一部分内容，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② 邓小平1987年11月11日和朝鲜总理李根模的谈话。

缺少这一部分,其思想史是不全面的。同时,对于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以说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础,没有前一种研究,后者是不可能研究得更清楚的。

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如此之重要,但研究起来,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一是资料缺乏。可供利用的《毛泽东选集》除第1—4卷外,第5卷的内容只到1957年为止,且不能公开引用,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选了几篇1957年后的文章,但数量太少、篇幅有限,而且是到1965年就截止了。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目前也未出齐。这种情况不能不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二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有互相脱节的情况;毛泽东个人和党中央集体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互相影响等等。他的思想、理论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又包含有片面的真理性;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谬误。有的理论上基本正确,但实践上没有能够贯彻;有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有错误,但理论概括却基本正确,这一点在哲学思想上更多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在1956年后许多思想和决策,是党中央同意或认可了的;有些则是未经中央充分讨论而由个人作出的。因此研究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化,既不能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能作简单的否定;既不能因为理论上、文件上有某些正确的话,就肯定其实践也真的正确,也不能因为实践上犯了错误,反过来就简单地以为其基本理论也是错误的;既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他,也不能因为党中央也有错

误而为他开脱主要责任。既要看到国内因素所起的作用，又要看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一切都要求研究者有辩证思维的头脑，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三是研究者思想上的负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有学术性，又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别是研究他晚年的失误，更是属于敏感性的问题，政治上要担风险，理论上要有勇气。由于怕犯错误等等原因，研究者往往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也增加了研究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困难，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想不应畏缩不前，而应知难而进。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

正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作者不揣冒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5 周年之际，把这本非常粗糙的小书奉献于广大读者，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版，第 85 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转折与两类矛盾学说的产生	(1)
第一节 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和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
第二节 整风、反右派与两类矛盾学说的产生和演化	(19)
第三节 两类矛盾学说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局限性 ...	(32)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与 哲学上的反思	(47)
第一节 “三面红旗”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中的 空想因素	(47)
第二节 初步纠“左”的努力和“八字方针”的贯彻 ...	(63)
第三节 反思中对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阐发	(75)
第三章 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与阶级斗争扩 大化错误理论的逐步升级.....	(115)
第一节 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	(115)
第二节 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失误.....	(120)
第三节 阶级范畴的主观化.....	(128)

第四节	对党内斗争的错误理解·····	(135)
第五节	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系统化·····	(140)
第四章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	(146)
第一节	国际“反修”的迷误·····	(146)
第二节	国内“反修防修”的误区·····	(154)
第三节	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辨析·····	(175)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	(190)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190)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	(202)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实	
	质·····	(208)
第六章	毛泽东晚期“左”倾错误的哲学根源·····	(215)
第一节	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215)
第二节	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和对马列主义的某些	
	教条化理解·····	(219)
第三节	对辩证法理解和运用上的主观随意性·····	(222)
第四节	历史观上的唯心论倾向·····	(226)
后 记	·····	(234)

第一章

历史的转折与两类矛盾学说的产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社会主义各国逐步摆脱斯大林模式,开始走上改革的路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我国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革命的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为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变。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地评价两类矛盾学说的科学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对于了解毛泽东晚期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和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它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各国摆脱“苏联模式”的开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务的提出,既是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又是以苏联的教训为鉴戒的。

一、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解冻”。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保证集体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他还认为,世界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取得政权。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向二十大的全体代表作了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用大量篇幅揭露斯大林滥用权力、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感情色彩极浓,但未能对斯大林的错误从理论上作深刻的分析,未能从社会历史根源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上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把一切归之

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粗暴性格，因而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历史地看，苏共二十大有它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使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起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重新思考自己的革命道路；消极方面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很大的挫折。毛泽东曾经说过：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办法，在几个月里，引起世界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波匈事件，所以有它错误的方面。^①

事情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苏共二十大后，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乘机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杜勒斯公开叫嚣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出现了由于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部分党员纷纷退党的现象。接着东欧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6年6月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工人对国家经济状况和苏联过去对波兰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而上街游行。这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但波兰当局处理不当，派保安部队镇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在波兰事件中，赫鲁晓夫曾调动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企图以武力威胁波兰。同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比较复

^①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42页。

杂。一方面是匈牙利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照搬苏联的做法，政治上搞专制主义，破坏民主和法制，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经济上实行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强调积累而忽视消费的错误政策，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思想文化方面，忽视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群众思想极度混乱。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竭力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支持企图复辟的反动势力和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并利用宗教势力，策划反革命暴乱，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都布达佩斯曾一度被占领。在这个紧急关头，赫鲁晓夫惊慌失措，曾打算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不愿意给匈牙利人民以必要的援助，后经我党的劝说和努力，苏联政府才出动苏联红军，援助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扑灭了反革命暴乱。

这些事件发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议论纷纷。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人发表演说和评论，他们讲了很多正确的意见，如谴责匈牙利反革命分子，表示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批判个人崇拜和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但同时也说了许多片面的、感情用事的话，如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同“斯大林分子”作斗争等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人们很大的困惑与不安。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思考：如何正确地评价斯大林？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怎样发生的？波匈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教训？我们国内的事情应该怎样办？怎样以苏联为鉴戒，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少走弯路？

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突出表现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中。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提议和主持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成的。毛泽东在支持和修改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①

第一，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

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或改写了这样几段话：“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他的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在文中论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的一段文字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其他段落中，毛泽东还加写了这样几段话：“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

^① 该文的修改情况参看《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43—47页。